

本报记者 刘世昕
实习生 宁迪

久违的蓝天总算出现在了北京2月1日的早晨。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1月，北京仅有5天逃脱了雾霾的魔爪。

根据环保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的数据，1月30日，全国有143万平方公里受到雾霾的侵袭。

多年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和他的团队一直致力于绘制中国污染地图，以便公众能更好地对身边的污染企业进行监督。而这一次，他却发现，卫星遥感数据勾画出的雾霾范围与我国重化工产业的布局高度重合。

京津冀地区是整个1月份雾霾天的重灾区。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这一地区每年的粗钢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1/5。支撑这个“骄人”数据的，还有大量的煤炭燃烧，大量污染的排放。

再看长三角地区，近年来的雾霾天也在不断增加，而在马军的污染地图上，过去10年，这一地区的产业结构正由“轻”变“重”。

马军的这一发现在业界已是共识。

1月北京仅有5天没有灰霾 ■重化工分布与PM_{2.5}重污染区重合 呛人的空气拷问经济发展方式

2012年年底，国务院批准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旨在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空气污染较重的地区出重拳治理。据介绍，这些地区污染排放高度集中，单位面积污染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9~3.6倍。

规划中，空气质量需要重点整治的地区已占到国土面积的14%，基本也与这次大面积雾霾天的范围一致。

这些地区的经济总量、煤炭消费量分别占全国的71%、52%。相对应的是，这占国土面积14%的地区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占全国的48%、51%。按照2011年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标准，重点区域内地82%的城市达不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北京代表处的能源高级顾问杨富强给出了更详细的数据：北京煤炭的消费量达2000万吨，天津是7000万吨，而河北是3亿吨，山东是4亿吨……整个华北地区每年要烧掉10亿吨煤。

国土面积跟中国相当的美，全国的煤炭消费量也只有11亿吨。我国有这样庞大的煤炭消费量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雾霾天驱之不去。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宏春看来，面对一个月只有5天看得见蓝天的现实，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必须提速。

最新的消息是，1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2015年要将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0亿吨标准煤。有评论认为，这是国家给能源消费划出了消费红线，今后煤炭消费量的增长要被严格控制。再往下传导的效应是，高能耗的重工业也将遭遇能源瓶颈。

如何实现能源消费总量的控制？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副所长戴彦德给出的建议是，首先，中央要给出能源结构调整的时间表。尤其要明确，在能源结构中不能再“一煤独大”，要实现煤炭、油气、核能和清洁能源各占1/3，三分天下的比例。其次，要对现有产业进行节能改造，提高能效，减少排放。

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司长赵华林说，在《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中，国家已经提出了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的构想，有可能率先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与山东城市群开展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试点，通过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倒逼地方政府积极发展清洁能源，调整产业结构。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研究员姜克隽认为，煤炭消费的总量控制对改善雾霾天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北京市为例，雾霾天气成因中，燃煤贡献占1/4，机动车占1/4，油烟不到1/4，有机物挥发物和扬尘等占了1/4。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相当于对1/4的燃煤污染开刀。

在周宏春看来，当务之急是，频频受灰霾天侵袭的这些地区，应该紧急核算出自己区域内的纳污容量，以此来评价未来还能不能再上重化工类的项目。比如，华北地区，煤炭消费量已经高达10亿吨，究竟还有没有环境容量再容纳钢铁、水泥项目？再有，鉴于空气污染的跨区域特征，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在审批新的重化工项目时，应该从整个区域的环境来考虑。

近年来，重工业如脱缰野马般的发展，原因在于，一个重化工项目能拉动的GDP效果明显。杨富强则希望，地方官员要换个思路想问题，一个钢铁厂，短期内可能会给GDP的增速添加砝码，但是从长远看，如果环境严重污染，为了应对雾霾，汽车要停驶，工厂要停工，甚至社会还要支付高昂的医疗成本。总体来看，为环境治理的费用要远远高于几个重化工项目拉动的GDP。

周宏春说，过去我们认为的现代化就是满街跑汽车，大型工厂烟囱林立，时至今日，当我们连清洁的空气都呼吸不了时，必须重新思考什么是现代化。

本报北京2月3日电

威海一船企诉两跨国公司 首赢管辖权争议胜利 中国船企大而不强何日掌握行业话语权

备受鼓舞。”谈及这场胜利，西霞口船业公司法律顾问刘玉宁难掩内心的喜悦，“经过旷日持久的努力，我们争了一口气。”

目前，我国已成为头号造船大国，但游戏规则却一直由外国企业把持，我国船企缺乏话语权，更缺乏一个运用法律公正解决争议的平台。此次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扭转了中国造船业在司法救济领域的被动地位，为中国船企提供了享有救济权利的渠道。

弃船在先，“以旧充新”在后

2006年6月3日，西霞口船业公司与荷兰西特福船运公司签订了建造两艘12500吨多用途运输轮的船舶建造合同，每艘船的合同造价款为2049万美元。

西霞口船业公司作为西霞口集团下属的村办企业，始建于1988年，之前以建造渔船、小型散货船为主。而西特福是荷兰最大的船商，实力雄厚。能从跨国大型船公司拿到订单，西霞口船业一开始欣喜不已。可没想到，这次合作带来的竟是无尽的烦恼。

依照双方签订的《12500吨技术规格书》，西特福公司指定要求西霞口船业购买由芬兰瓦锡兰公司生产的型号为W6L46的主发动机、推进系统及相关设备。2007年1月22日，按照船东的要求，西霞口船业委托中国电子进出口山东公司与瓦锡兰订立了两份12500吨多用途船主机及相关设备的买卖合同，单台主机合同价款为301.93万欧元。

2007年4月，西霞口船业开始建造，1号多用途运输船，在该公司总经理王强看来，这一建造过程可谓费尽周折，“没碰到过这么难伺候的船东”。

西霞口船业曾就此向外界公开发公开称，在船舶建造过程中，每个需要船东配合的环节，西特福都百般刁难，先后额外用时共计长达19个多月，为其故意弃船寻找理由。

2009年7月13日，西特福公司借口西霞口船业生产严重逾期，宣布解除造船合同，对1号船弃船，并要求船厂退还造船预付款及其利息。2009年10月12日，在未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西特福公司将其驻厂代表撤离船厂。

随后，西霞口船业向西特福公司发出

仲裁通知，主要内容是对方没有权利弃船，船舶延期交付的原因在于西特福驻厂代表严重不配合检验。对此，西特福公司立即应诉答辩。

就在两者为弃船是否合理争辩不休之际，西霞口船业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2011年3月，安装了瓦锡兰主机的1号船在进行试航时，主机滑油压力始终过低，后经瓦锡兰上海公司售后服务人员屡次调试，未能成功。

2011年4月28日，瓦锡兰上海公司售后服务人员给西霞口船业发来邮件称，“1号船”滑油压力始终偏低，原因在于发动机系荷兰船东在别处购买的旧机器，由瓦锡兰公司翻新后，再卖给西霞口船业。技术人员同时表示，通过调试无法将滑油的压力调至理想状态，只有更换轴瓦和连杆瓦，才能解决问题。

获知这一情况，西霞口船业既惊又气愤。“作为跨国企业，他们故意弃船在先，而且竟然以旧充新，简直太欺负人了，我们一定要有个说法。”西霞口船业总经理王强说。

2011年6月，西霞口船厂就此将瓦锡兰公司及其上海公司告至青岛海事法院，告其欺诈。随后，西特福公司被迫加作为共同被告。

2011年7月，经青岛双诚船舶技术咨询公司鉴定，瓦锡兰销售给西霞口船业的发动机被证实为“翻新后的二手主机”。

据王强介绍，因为西特福驻厂代表的拖延以及后期发动机的问题，导致首船一再延期交付，这进而连带影响了2号船的进度，西霞口船业公司为此直接损失1000多万元。

在对国际仲裁规则不熟悉，我国船企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梳理近年来发生的涉外仲裁纠纷案件，中国船企几乎没有胜诉的案例。

据业内人士介绍，就算中国船企在外国侥幸打赢了官司，也面临执行难的问题。这就意味着，由于外国船东故意刁难或违约带来的损失，往往只能由中国船企消化。

在上述两大跨国公司向中国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后，2011年11月11日，伦敦高等法院判令西霞口船业撤回在青岛海事法院的诉讼，而且要求船厂必须无条件答应西特福公司有权向青岛海事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面对外方的强势行为，2011年11月21日，青岛海事法院裁定驳回外方企业的管辖权异议。上述三被告对此裁定不服，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山东省高院尚未就此上诉作出终审裁定前，2012年2月9日，伦敦仲裁庭已就西霞口船业和西特福公司的争议作出裁决——裁定西特福公司有权解除合同，西霞口船业败诉，应当退还造船预付款及相应利息。随后，西特福公司向西霞口船业发出弃船通知，并要求对方履行仲裁裁决。

2012年3月13日，山东省高院终审维持了青岛海事法院的裁定，驳回上述三被告的管辖权异议上诉。随即，三被告不服此终审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经提审及开庭审理等程序后，2012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案作出终审裁定，因“案涉两份仲裁协议均不能约束本案共同侵权纠纷的所有当事人”，故“青岛海事法院对案涉纠纷予以受理，并无不当”。

这份裁定意味着，经过旷日持久的较量，在审判归属地的问题上，西霞口船业公司赢得了胜利，从而开启了首次中国船企与外国船商争夺管辖权的首次胜诉。国内众多船业同行对此纷纷表达了祝贺。

青岛海事法院一名法官甚至专门给刘玉宁发来邮件：“祝贺你们为中国广大受



诚信合作 共同发展

中青广告俱乐部
为帮助地方广告公司深入了解《中国青年报》所倡导的主流价值和文化，了解《中国青年报》的经营理念和管理经验，中国青少年报社成立“中青地方广告代理公司俱乐部”（简称“中青广告俱乐部”），热忱欢迎各地广告代理公司、大型公关公司、4A公司加入。

即能专享五大会员服务：

- 1：中青报公共营销产品服务；
- 2：中青报经营资讯服务；
- 3：中青广告微博平台信息服务；
- 4：中青广告qq交流群信息服务；
- 5：中青报品牌活动特邀席位。

中国青少年报社
中青在线 WWW.CYOL.NET

登录：
中青在线 www.cyol.net
广告频道
即可下载：
2013年地方广告代理招商书
中青广告俱乐部会员申请表
中青广告发布说明书
2013年《中国青年报》广告刊例

完整填写后请发送至 cydad@sina.com

咨询热线：
010-64098333
联系人：陈霞
010-64098416
联系人：李楠
咨询qq：
978620678、125304382
邮箱：cydad@sina.com
（请注明“代理公司咨询”）

2013 中国青年报社 诚征地方广告代理公司

中国青年报社为探索拓展地方广告业务，特面向全国诚征广告代理公司，诚信合作，共同发展，欢迎全国各地广告代理公司踊跃加入。

62年辉煌历史铸就金字招牌
亿万青年的忠实朋友
理性、新锐、深度报道，成就国家级大报
中国青年报社欢迎有识之士的关注和加盟！

委屈的船企争了一口气！”

胜利背后的反思

在这场中国船企与跨国公司的较量中，刘玉宁始终参与其中。在他看来，虽然中国的造船业近年来快速发展，造船业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中国船企却很少有话语权。与外国船东签订的这种格式合同，就证明号称造船大国的中国船企还很弱势。

公开数据显示，2012年1月-10月，中国造船业出口总值达336亿美元，超过韩国成为世界最大造船出口国。

深陷官司漩涡的西霞口船业总经理王强对这组数字并不“感冒”。他认为，中国的造船业基本还处在无序竞争的初级状态，缺乏核心技术，很少能造出海洋工程、LNG等高端船舶，造船业大而不强，因此缺乏话语权，一旦遇到经济波动，往往最先遭受冲击。

王强说，西特福此次弃船，大的背景正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导致国际航运需求锐减。“航运市场好的时候，一艘1.25万吨的货轮一天的租金有近两万美元。现在，市场不好，租金已经跌到每天3000美元，而且，维护保养还要产生费用。这种情况下，船东自然想把风险嫁祸给船厂，想方设法弃船。”王强说。

对于外方格式合同中的霸王条款，刘玉宁建议，由我国船舶行业协会出面，协调国内各个造船企业，制定有利于我方的格式合同，从而打破外方的霸权。

但王强并不认同这个建议。在他看来，中国的造船业最大的问题在于技术含量低，企业无序竞争，不重视行业协会的作用，难以形成能够让外国船东接受的合同文本。

山东省船舶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黄海造船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周安昌对此持相同观点。他告诉记者，中国造船企业的问题在于创新能力不强，不注重提高附加值，很多船厂在应对新规范、新标准方面，明显滞后，长期停留在粗制滥造的阶段。以1万集装箱以上的船舶为例，国内只有两三家船厂能造出来。

在老船人周安昌看来，中国船舶业要赶上日本、韩国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最近3-5年内，这条路不会走得太顺利。“目前国内船舶业面临交船难、融资难、接单难、生存难。单就造船合同价款来说，这两年价格平均跌了三到四成。”

这种寒意，西霞口船业公司已深有感受。王强介绍说，船业公司现在已经不接造船的单子，事实上这类单子也不多，而是转做拆船业务，目的在于维持生存。对这家村办造船厂来说，目前的努力主要在于求生存，求发展已放在其后。

冬天将会持续多久，王强并不清楚，也无法掌控。他眼前最关心的，还是接下来如何打赢官司，“现在只是赢得了程序上的胜利，实体部分我们也要步步为营，争取取得最终胜利。”

中央与地方GDP“打架”何时了

经济时评

叶祝颐

近日，全国31个省（区、市）的人大会议相继召开。各省级政府都向当地人大提交了去年的经济发展答卷。有记者发现，去年全国各省（区、市）核算出的GDP相加总量达到57.69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2012年初步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51.93万亿元高出5.76万亿元，相当于多出一个广东的经济总量。这种现象已经持续多年。

据介绍，自1985年国家和地方层面分别核算GDP数据以来，地方统计总和一直高于全国的GDP总量，不仅呈现出“1+1>2”的局面，而且有递增的趋势。例如，2009年各省GDP之和超出全国2.68万亿元；2010年各省GDP之和超出全国3.2万亿元；2010年31省区市GDP超出全国总量3.5万亿元；2011年31省区市GDP之和超出全国总量4.6万亿元，而2012年地方GDP之和竟然超出全国5.76万亿元之多。

针对统计数据造假的问题，国家统计局、监察部、司法部曾联合部署全国统计执法检查活动。检查组要求“严肃查处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理一批顶风作案的责任人，坚决遏制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现象”。2012年3月，国家统计局还曝光了地方政府干预企业统计数据上报造假的案例，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多次强调惩治和预防统计弄虚作假行为。但是，地方GDP之和高于全国数据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呈现递增趋势，不知是统计技术差异，还是执法力度不够？

有的地方在统计GDP时搞双轨制：“摆数据时是一个数字，要补账时又是一个数字”，甚至身兼“百强县”、“贫困县”两个头衔。如果没有扎实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的改善，表面上的GDP繁荣，非但没有意义，还可能误导宏观决策，挤占民生空间。而有的地方官员还躺在GDP政绩的沙袋上沾沾自喜。统计数字注水、GDP层层加码，地区之间互相攀比的现象屡见不鲜。

在笔者看来，不仅统计数据要打假，GDP核算体系也要转型。针对GDP注水的问题，取消地方GDP统计的呼声不断。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全国人大委员吴晓灵都提出了类似建议。马建堂曾表示，统一核算地方GDP非常重要，国家统计局会同地方统计局对2010年前两个季度GDP统一核算进行了试点，有了初步方案，正式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意见后，按程序报批。时至今日，GDP统一核算体系仍然没有下文。

要挤出统计水分，除了揪统计检查风暴，设计制度补丁以外，修正官员政绩评价体系尤为必要。只有痛下决心改革政绩评价体系，保持对官员政绩考核的连续性，增加民众对官员政绩考核的话语权，让地方政府不单纯对GDP负责，也对生态环境、公共服务、民生福祉、可持续发展负责，才有望修正官员的GDP政绩观，逐步摆脱中央与地方GDP打架的尴尬，实现政府职能的华丽转型。